

学者的文化资本

——以国家重点学科为例

Xue zhe De
Wenhua Ziben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鄂东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 周守军 著

学者的文化资本

—以国家重点学科为例

Xue zhe De
Wenhua Ziben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者的文化资本:以国家重点学科为例/周守军著

. 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6

ISBN 978-7-80170-931-8

I. ①学… II. ①周… III. ①科学研究事业—中国

IV. ①G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7880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胡 昶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化资本与学者.....	9
第一节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 9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社会生成	/ 19
第三节 学者的文化资本形态	/ 29
第四节 学者的文化资本的特性	/ 32
第二章 文化资本的学科场域	35
第一节 场域	/ 36
第二节 国家重点学科场域中的政策系统	/ 41
第三节 国家重点学科场域的结构分布系统	/ 47
第三章 学者的文化资本积累	60
第一节 文化资本积累的特点	/ 60
第二节 学者的文化资本积累特点	/ 62
第三节 学者文化资本积累的基础	/ 68
第四节 学者的文化资本积累的途径	/ 70

第四章 学者的文化资本转换	77
第一节 文化资本转换的场域性建构	/ 77
第二节 学者的文化资本价值变迁	/ 82
第三节 文化资本的权力转换与财富转换	/ 85
第五章 社会资本与学者的文化资本	88
第一节 资源及其价值赋予	/ 89
第二节 学者的社会互动	/ 96
第三节 文化资本定律	/ 100
第六章 学者的文化资本再生产	107
第一节 文化资本的“隐蔽”性	/ 107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等级性	/ 113
第三节 大学：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 120
第四节 Habitus：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机制	/ 127
第五节 学术精英再生产	/ 134
参考文献	138
后 记	145

引 言

学科是大学承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是大学建设的永恒主题。大学学者是学科建设的最关键要素。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而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居于骨干和引领地位”，^① 国家重点学科要实现“一批学科总体水平处于国内同类学科前列，其中部分学科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② 的目标，就必须提高大学学者的知识生产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学者的文化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环境。

学者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取、再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的。社会结构内嵌着各种资源和位置（location and position）。位置受政策制度的影响，预设着占有者及其地位与权力。结构、位置、资源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场域，它们互为约束，互为建构。作为大学文化资本持有者的学者就生活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诸多政策和大学学者所应遵守的诸多学术规范以“Habitus”的形式作用于学者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再生产着社会的等级结构，生产着学术精英。学者们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实现文化资本积累的增加和再生产，在最终目标上与国家目标、政府目标、大学目标达成一致：成为社会精英结构的精英者。不过，学者最后的角色仍然是被支配的支配者。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具有建制特征、专业利益、资本分配和转换机制的场域，它以自己独特的文化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场域，但是又

① 引自 2006 年的《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② 引自 2006 年的《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与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大学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其资本结构和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大学拥有了一定限度的自主权。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本虽不像以前那样可以主宰大学和学者的命运，但是也从未失去作用，现行的学术体制仍然是一个行政化的体制，学术还是没有完全步入按知识逻辑发展的轨道。以行政手段分配学术资源、任命学科带头人、审核科研课题的申报资格、评定学者的学术业绩的现象仍十分普遍。从大学的本真意义上分析，大学不应是一个行政机构，主导大学发展的不应是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而应是由学者们创造生产的、可以引领社会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价值评价、分配方式应该有其自己的逻辑和标准，应该服从于大学的专业利益。大学的存在意义应该体现在文化的继承、传播与生产。大学应以其创新能力和培养高规格的人才为社会树立典范。所有这些“应该”做的事情却在不断地受到社会外力的干预。大学的价值在受到社会质疑的同时，生活在大学之内的学者们也在呼吁大学核心价值的保护。

将一批大学的学科提升到国家地位、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建设大学的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现象。国家、政府、大学学科是按各自的目标逻辑体系组成的社会系统。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位，是知识生产“车间”，政府冒干预大学的风险、以国家的名义来建设大学的学科，将管理的触角伸入到大学的基层单位，是什么因素使这些目标各异的系统聚焦于“学科”？难道“学科”存在着它们的利益共同点？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除了一种宣言式目的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目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2006年，笔者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学学科组织成长机理研究”的调查研究工作。该项目将学科组织作为一种知识劳动型组织，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将学科组织的成长分为生成期、生长期、成熟期、蜕变期。将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成熟的学科组织。项目组成员从2006年到2007年8月对158个国家重点学科进行了问卷调查，对60个国家重点学科的带头人和其成员进行了访谈。从问卷调查和访谈中我明显感觉到了学者们对结构约束、学科资源配置不均、学者地位差异等问题的担忧。沿着学者们的担忧，笔者对国家重点学科分布现状作了表象处理，发现国家重点学科分布与社会的政治结构分布和经济结构分布有着相似性。这引起了笔者的思考：政治、经济、大学学科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的力量主导着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国家、政府、政党、大学、学科、政治、经济这些看似关系很少的因素被很自然地联系到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学者成为了这些因素最直接的作用对象。经此分析，在学者的身上就应聚集着这些因素的共需部分。研究学者，有可能发现这些问题的某些答案。

学者是大学地位和学科水平的最关键者。世界著名的大学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这些大学拥有世界杰出的学者，他们可持续地进行着知识的继承与生产。一个学科的学者水平和生存状态直接标志着这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生存现实。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是学者水平的最重要的体现。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是学者进行文化资本积累的最主要途径。如果我们将研究的着重点更进一步地深入到学者的文化资本，那么，我们有可能发现对这些问题的奇妙解释。

在哲学意义上，“资本是积累的劳动，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在规律的原则。”^①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 ~ 2002.）将资本的概念拓宽应用到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布迪厄创造“文化资本”理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学理渊源。18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社会现代化的起步和深化，一些著名学者已经认识到资本有多种形式，在他们的著述中含有相关的思想痕迹。例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等等，可以从中发现论及“文化资本”的浮光掠影。近而言之，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等论著中，已经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现代社会的思路或初步的思想观点。20世纪60年代，在经典现代化理论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论说中，明确提出科技是独立形式的资本、价值观念具有资本功能的思想。后来，在未来主义的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丹尼尔·贝尔对文化资本引起现代社会面貌的改观进行了很充实的论述，只不过他没有明确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布迪厄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社会具有积累性。作为劳动累积的资本，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赋予社会以历史性，而且，资本总是被不同的主体占有，从而赋予社会以结构性。当着积累的社会劳动被具体的主体排他性占有时，他们就可以借此占有社会资源，从而获得自己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与权利。布迪厄指出，资本是社会界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界的内在结构，即包含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一套强制性因素，后者以一种持久的

^①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89.

方式掌控了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并决定了实践能否成功。”^① 布迪厄指出，构成社会界的结构性因素的是一切形式的资本。“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一切形式，否则是不可能对社会的结构和作用加以解释的。”在现代社会里，至少有三种不可忽视的资本类型：一是经济资本，通常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二是文化资本，一般通过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三是社会资本，它是通过社会联系形成的，以某种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头衔被制度化。^② 在这三种形式的资本中，经济资本是基础，三种资本可以互相转换。

自从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范畴，到1986年他发表《资本的形式》一文，文化资本的理论从产生到形成，距今才有几十年的时间。布迪厄用“文化资本”概念最初探究了一系列处于文化、阶级和权力的交叉领域的广泛课题，直至2002年1月23日逝世，他的文化资本理论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布迪厄去世后，他的生前好友罗克·华康德教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研究中心致力于文化资本和文化——经济的研究，成为海外研究和传播文化资本理论的中心。

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资本”进入中国学术界，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它作为一种关涉现代资本形式的理论，带动了中国关于“资本”的新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布迪厄的理论最先是作为一种教育社会学思潮介绍到中国的。后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整理介绍过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中文研究所的包亚明研究员编译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于1997年1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成为国内专门介绍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较早的专著。布迪厄去世后，国内出现了介绍、研究布迪厄思想理论的一股热潮。2002年，《继承人》和《再生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实践感》在译林出版社刊印；2004年，《国家精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布迪厄在上述书籍中分散地提出和阐发了“文化资本”理论，它们的汉译版本首次在国内问世，推动了中国学人对“文化资本”的研究。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金元浦教授于2003年1月主编了《文化研究》第4辑，专门介绍布迪厄的文化理论；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后朱国华著成《权力的文化逻辑》一书，集中评介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出版了多部有关布迪厄的著作，使我国读者对布迪厄的复杂理论和思想有所了解。中国学者高宣扬对布迪厄的理论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布迪厄的

①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

②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2.

再生产理论、场域理论、象征性权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① 陶东风翻译出版了西方学者戴维·斯沃茨的研究布迪厄的著作《文化与权力》^②。目前,介绍和研究布迪厄理论的中心在中央编译局,此处曾经最先出版了布迪厄的《实践与反思》(1998)、《艺术的法则》(2001)等著作,其所办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副主编薛晓源,对文化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2005年4月,薛晓源、曹荣湘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资本》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此乃介绍“文化资本”理论及研究状况的集成新著。

在研究性论文中,我国学者仍然以介绍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主,少数学者用文化资本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万俊人于1999年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文化资本与管理伦理》一文,文章立足于当代诸社会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视角,分析阐释了“文化资本”这一崭新的管理哲学概念。由此切入,文章以理论分析与个案例证相交叉的互证方式,探究了现代管理哲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相互增生的社会现象,进而提出了管理伦理的新理念及其基本解释,探索了现代管理伦理的新课题及开拓这一富于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课题之紧迫性和艰巨性;周庆智2001年在《人文杂志》上发表《文化资本及其他:对一种人文现象的检讨》一文,对知识分子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和人文精神没落进行了研究,鼓励知识分子保持人文精神;李煜于2001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一文,讨论了文化资本的多样性对网络资源占有的影响;卜长莉于2003年在《中国行政管理》发表《文化资本多寡决定财富分配高低——布迪厄文化资本投资的启示》一文,指出文化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能够自身增值,需要接受教育学习和相应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投资。文化资本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了由强到弱,由弱到强的转变过程。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资本投资是最理智的选择;姚俭建、岑文忠于2004年3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探微》,指出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资本的积累起了基础性作用。文章力求从市场、权力和教育三个不同层面对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进行分析,廓清文化资本积累自身的内在逻辑,探求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路径,以求得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张怡于2004年在《外国文学》上发表《文化资本》一文,详细介绍了文化资本概念的内涵;徐艳于2004年在《学术探索》上发表《文化

①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2).

②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

资本的占有与缺失——兼论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一文，指出文字时代的知识分子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文化资本，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获取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随着后文字时代的来临，图像逐渐代替了文字成为媒介的中心，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被剥夺，其社会地位亦被“文化新贵”所代替，知识分子从普遍走向了专业；郭凯于2005年在《当代教育科学》第16期上发表《文化资本与教育场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评》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布迪厄的教育再生产思想；刘丽娟2006年在《经济纵横》上发表《文化资本的交易模式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文，认为文化产业的特性是由文化资本特殊的存在形式决定的，文化资源只有进入交易才能变成资本。文化资本交易的特殊规律性决定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使文化资本在交易过程中增值，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朱伟珏在2005年提交了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研究》，对布迪厄“文化资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于2007年在《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经济学意义》，比较深入分析了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区别与联系。除此之外，李沛新、陈锋、李丽三人以“文化资本”为主题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李沛新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化资本论——关于文化资本运营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主要从我国文化产业落后的现状和民族文化保护的现状出发，用“文化资本”理论探讨了文化资本的性质、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文化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文化资本的重组；陈锋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化资本导论》对文化资本的范畴、运行、转换以及相关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制度建设、文化人转型等现实问题进行了论证和考察，从而构建起文化资本理论，同时对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李丽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化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考察了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过程与机理。论文提出和界定了文化资本的范畴，认为企业制度文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中的人际信任和企业生态伦理是影响企业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和核心要素；论文主要吸收和运用了经济增长学说中的文化因素影响论、管理学中的企业文化理论、社会文化学中的人际信任理论和环境经济学中的生态伦理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理论等最新研究成果，提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非经济因素，也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并直接推动着企业的持续发展。岑文忠、张至昊等人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也以文化资本为题进行了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

总体看来，国内对于“文化资本”的探讨刚刚起步，少见有学者把“文化资本”应用到学科建设的研究。因此，以“文化资本”为主题来作为学科

场域中的资本竞争，可以拓宽教育研究的对象。

把“文化”作为一种资本，这是西方学者分析社会结构问题时所发现的奇特视角和分析工具。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译介世界著名的文化资本理论，并尝试着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我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得出了一些新奇的解释。用“文化资本”作为分析工具，可以揭示社会结构的约束性、权力和资本的再生产性、个体地位的等级性。从学者的文化资本角度去分析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问题，有可能揭示出我国社会结构的精致性、制度的建构性、学术精英的等级性、学科建设的再生产性。

“资本”概念是经济学的最主要概念，此概念被拓宽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尤其是被应用到政治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极大地夯实了这些学科的理论基础。把“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并以“文化资本”概念出现在社会分析中，更增添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魅力。至于教育学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教育的公益性和高尚性，学者们一般忌讳将其领域的文化作为资本去研究。本研究尝试将“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功能性概念去分析一种奇特的社会教育现象——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将“文化资本”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区别意义、关系意义植根于国家系统、政府系统、大学系统中综合考察，可以拓宽学科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政治学和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理论研究。

“文化资本”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可以被应用到社会结构的分析领域，可以被应用到生命意义哲学的分析领域，可以被应用到资本和政治竞争领域，可以实现对这些领域的奇特解释。用“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解剖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所在的社会结构和学者的等级结构，可以从复杂的学科建设现象中分离出资本与权力并进行深层透视。因此，本研究可以丰富教育研究的手段，为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解释工具。

对学者拥有的文化资本进行研究，揭示了各种资源在学者中的差异性分配，进而揭示了各种权力和资源在大学的等级性配置。本研究所揭示的现象及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可以给学科建设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病理性诊断，所分析的结论可为高校决策者提供学科战略发展规划的价值判断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与“大学学科组织成长机理研究”项目组的成员从2006年到2007年8月对全国的国家重点学科按区域和学科的分布比例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890份，截至2007年8月，我们回收有效问卷158份。在回收的问卷中，自然科学类学科占82.3%，人文社科类学科占17.7%，两大学科门类回收比例与总体样本结构相当。考虑到军事院校的特殊性，我们没有对军事院校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按照区域和学科分布

对 60 个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和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国家重点学科专家进行访谈。被访谈者对学科建设状况的描述和学者的生存状态的叙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故事。我们将访谈录音整理成近 15 万字的研究资料作为项目的附加成果。本文的研究资料全部采自于该项目研究的基础资料。读者可以在《大学变革的逻辑》一书中找到这些资料。

第一章

文化资本与学者

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使他们能够占有社会资源。这种劳动是对投资回报的期待。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的有效资源，它同各种形式的权力，包括物质、象征、文化或社会的权力形式相联系，它使个体获得因为参与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资本概念包含了对某人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资本是一种权力的形式。资本在场域中根据不同位置上的不平均分布发挥效益，决定不同的权力对比。资本具有积累性和制度化的特点，例如通过财产的世袭、商品交换扩大经济资本。通过扩大社会影响，建立各种权力关系而增加社会资本。相比之下文化资本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体现这些性格。

第一节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学界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引言中笔者已作了基本介绍。本部分主要是直接和间接借用学者们的研究，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作简单梳理，读者可以参阅这些学者的著作和论文。

经济学家传统地将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物质资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而布迪厄却将文化作为资本，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并以该概念为分析工具，分析了众多的社会现象，显示了该概念的社会穿透力。

什么是文化？不同的分析视角会有不同的文化概念。按照澳大利亚学者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的观点，存在两种文化解释形式。一种解释是将文化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所谓的“文化产业（文化工

业)”所进行的所有活动。这种功能意义上的文化可以用经济的“文化部门”(cultural sector)来表示。对文化的第二种解释就是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化,这时文化被看作是一系列的态度、实践和信念。从功能和组成意义上定义的文化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就是它的作用。文化能够表达团体或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集体的行为。因此,从广义上讲,那些形成人类生活共同要素的东西都可以说具有文化价值。不过,文化价值有可能产生经济价值,尽管它和经济价值是不同的。从以上两种解释出发,如果文化价值是可以衡量的话,文化资本就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与此同时,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财富也许是以有形或无形的形式存在。这种有形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通常称为“文化遗产”)的建筑、遗址、艺术品和诸如油画、雕塑及其他以私人物品形式而存在的人工品之中。另一方面,无形的文化资本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想法、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本都会引起服务的流通,有时会以服务商品的形式满足人们的价值需求。^①

历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史。文化表征为符号系统,符号在现实性意义上具有专属性。也就是说,具体的文化总属于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现实的文化为其所有者赋予了奠定自己社会地位、历史坐标的权力。在现代社会,由于理性彰显,文化被科学化、知识化,人们往往把文化与知识、科学视为等同。在文化意义上,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把“知识”分为三类:(1)经验——分析的科学(empirical - analytic science);(2)历史——解释的科学(historical - hermeneutic science);(3)批判的科学(critical science)。经验——分析的科学主要是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知识;历史——解释的科学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要达到对于人类种种活动的意义的掌握从而使人类能够沟通;批判的科学就是人类通过自我反省来不断摆脱控制自己的一些枷锁的活动。^②因此,现代文化知识从根本上分为技术、科学、价值观念。在近现代化社会中,科学技术凭其可以控制对象、能为其拥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的功能,首先被接受为资本。历史地看,观念习俗也往往与经济价值相联系。以货币形式为例,在中国古代曾使用青铜和白银,有的地方认为玉石最有价值

① [澳]戴维·思罗斯比·潘飞编译.什么是文化资本·[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50~55.

②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48

的。这说明什么是宝物，什么是财产，有着文化的意义、观念的作用。文化与经济资本的关联存在文化资本化的根据。因此，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可以具有一般的资本属性。扬弃经济主义对“资本”的狭隘认识，澄清劳动的形式和资本的历史涵义，可知伴随社会现代化过程，文化资本成为一种资本形式。

从亚当·斯密开始，主流政治经济学把“资本”视为一种创收货币。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认识到，文化也具有资本的资格。这或许是亚当·斯密把精神生产作为非生产性劳动之故。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交换价值或能够用来交换的物品，只有那些能够被物化或固定在耐久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而脑力劳动“不生产价值，既不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出卖的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①一些学者对亚当·斯密的狭隘认识进行了批判和扬弃，孕育了“文化资本”的理念。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主张“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②物质生产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精神生产则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都属于生产性劳动。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利希·李斯特指出，“在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这些方面的进步……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都是劳动累积的结果。这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对这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③李斯特提出了“精神资本”范畴，而且还提出教育是传承“精神资本”、培养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主要手段。俄罗斯经济学家昂利·施托尔希把物质生产称为“财富”的生产，而把精神生产称之为“内在财富即文明要素”的生产，并揭示了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一国人民愈文明，该国国民财富本身就愈能增加。反过来也是一样。”^④施托尔希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特点在于它的无形性、不可磨损性，即“原始的内在财富决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而被消灭，它们会由于不断运用而增加并扩大起来，所以，它们的消费本身会增加它们的价值。”^⑤这实

①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5。

② [法]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9。

③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1~124。

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5。

⑤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7。

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对文化资本基本属性的认识了。

文化资本理论的最重要的创立者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86年,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的理论。文化资本范畴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资本范畴的进一步抽象的基础上的。文化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源。现实世界是文化世界,也就是人类劳动累积成的人化世界。布迪厄看到了这一事实,提出社会是一个积累的世界,“资本是积累的劳动”,“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种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的原则”。^①

文化资本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在于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社会出现各种劳动分工,它们形式不同但具有根本的同质性。它们的主体可以凭借自己资本的占有,获取的社会报酬与社会身份;不同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从而在形式上形成主体的社会群体。因此,正如布迪厄所言,在社会界中,资本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界的内在结构,即包含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一套强制性因素,后者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掌控了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并决定了实践能否成功。”^②在此以前,人们往往把资本等同于货币,即认为资本就只有经济资本一种形式。这是经济主义的主导影响造成的。实际上,构成社会界的结构性因素的是一切形式的资本。“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一切形式,否则是不可能对社会的结构和作用加以解释的。”^③

学者张怡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路径进行了研究。在其所写的《文化资本》一文中概括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思想产生的三大西方古典社会学的传统:涂尔干社会关系分类图式与社会客观分类对应的思路;韦伯利用经济学术语研究宗教、精神空间的启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布迪厄将“资本”概念广泛应用于文化分析,他所说的资本接近于、同时又超出马克思原本定义的资本。在他看来,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它以物化形式,或具体化、身体化的形式呈现)。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这种劳动(资本)使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首先,布迪厄大胆将资本概念与权力概念相联系,而这一权力概念包括各种物质、象征、文化或社会权力形式。如此一来,他的资本概念便从原有的物质化

①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

②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

③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